

学校编码: 10384  
学号: 200401002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UDC\_\_\_\_\_

廈門大學

碩 士 学 位 论 文

五四新文学的晚清思想渊源

The source from Late Qing Dynasty of May 4<sup>th</sup> literature

何刚晴

指导教师姓名: 俞兆平 教 授

贺昌盛 副教授

专 业 名 称: 文 艺 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07 年 5 月

论文答辩时间: 2007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07 年 5 月

##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兹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的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厦门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厦门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本学位论文属于

1. 保密 ( )，在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2. 不保密 ( )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 摘 要

五四时期同时拥有文学启蒙观、文学审美观和综合文学观——“人的文学”等多元辩证形态。但其形成并非突发，其量变过程和思想语境的形成始于晚清，正是晚清现代性萌芽与开端的历史积淀，成就了“五四”多元文学景观。

五四思想启蒙的时代，五四文学充满了启蒙理性主义，在这种精神下的文学观念带有了浓厚的社会性、现实性、批判性和工具性倾向。五四文学革命中所带有的强烈工具性和功利论的文学主张和实践在启蒙话语、创作倾向、知识范式等方面均延续了晚清的“新小说”运动。

在启蒙的背后，在“人的觉醒”之后，个人主义情感与美感的自觉，成为了文学的另一种追求。五四时期文学的独立性与审美性的强调与启蒙文学观针锋相对，当然这种对峙，仍然从晚清开始：这不仅有创作倾向上身体性、情感性话语的共鸣；还有自叙传、主观化抒情小说，日记体、书信体等私人化小说叙事模式的承接；更有理论话语上坚持文学情感性、自身性、独立性、审美性的延续。

五四文学观念既有强调社会、现实、人生的启蒙文学观，又有强调情感、美感、文学自身意义的独立文学观。对这一正一反的对峙，五四时期出现了将两者结合，辩证统一的文学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其实不光是周作人的“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创造社的文学观念也并非纯粹的“艺术派”，而是将“人生与艺术”在更高程度上进行了统一。文学研究会中，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许多成员均表明要将人生与艺术结合，否认一种为宣传、教育而作的文学。这种历史性的综合意识很大程度上渊源于晚清，特别是王国维、黄魔西、东海觉我、金松岑等人对文学的看法。

**关键词：**五四新文学； 晚清； 渊源

## Abstract

The views of literary enlightenment, literary aesthetic and literature of human beings did exist simultaneously during the May 4<sup>th</sup> movement. While these views did not come into being suddenly, their process of forming and thinking background both began from Late Qing Dynasty; what's more, a series of native backgrounds such as their theory discourse, trend of writing, narrative pattern and knowledge background all came from Late Qing Dynasty. Because of sprouting up of the modernity and historic accumulating, in the May 4<sup>th</sup>, there would be a picture of multi-literature.

The May 4<sup>th</sup> is a period of thinking enlightenment, its literature was full of rational enlightenment. In this spirit, the literary view had a trend of sociality, reality, criticism and toolism. The literary opinion and practice in the May 4<sup>th</sup> both continue the "new fiction"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t the back of enlightenment, after the "the wake of human being", individual feeling and consciousness of the sense of aesthetic, had become the another pursue of literature. The emphasis on the aesthetic during the May 4<sup>th</sup> is the opposite of the literary enlightenment, but this paradox still began from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not only shared th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discourses, but also have the same narrative model on the subjective fictions and individual fictions.

The May 4<sup>th</sup> literary views put the emphasis both 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aesthetic, this paradox was combined by Zhou zuoren into a new literary view named "the literature of human beings". Actually, besides Zhou zuoren's opinion, the creator society's view was not pure artist, it combined the life and art at the higher level. The Literary Research Society also advocated putting the life and art together, their members just like Mao dun, Zheng zhenduo, Ye shengtao, Bing xin all denied to view the literature as a weapon of political and insisted on the aesthetic. This historical synthetic consciousness came from lat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the opinions of Wang guowei, Huang moxi, Xu nianci, Jin songcen.

**Key Words :** The May 4<sup>th</sup> literary; Late Qing Dynasty; Source

##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五四新文学启蒙理性主义的晚清渊源	3
第一节 文学启蒙观念的逻辑延伸	3
第二节 社会批判性创作倾向的认同	7
第三节 共同的知识范式与知识渊源	11
第二章 五四新文学主情性与审美性的晚清渊源	16
第一节 个人化情欲叙事的脉流	16
第二节 个人化抒情叙事模式的承接	20
第三节 文学审美独立理论的形成	23
第三章 五四新文学“人生的艺术”综合文学观的晚清渊源	28
第一节 文学研究会的人生与艺术综合的观念	28
第二节 周作人的“人生的艺术”理论观念	32
第三节 晚清文学中“人生的艺术”的综合观念	35
结语	40
参考文献	41
后记	45

---

## Abstract

<b>Preface</b> .....	1
<b>Chapter one</b> <b>The source from late Qing Dynasty of May 4th literature about enlightenment</b> .....	3
Section one <b>The logic ext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literary view</b> .....	3
Section two <b>The agreement of the critical tend of creation</b> .....	7
Section three <b>The common knowledge format and source</b> .....	11
<b>Chapter two</b> <b>The source from late Qing Dynasty of May 4th literature about atheistic</b> .....	16
Section one <b>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narrative</b> .....	16
Section two <b>The expanse of the individual narrative pattern</b> .....	20
Section three <b>The making up of independent theory of atheistic literature</b> .....	23
<b>Chapter three</b> <b>The source from late Qing Dynasty of May 4th literature about the comprehensive literary view named “the art of life”</b> .....	28
Section one <b>The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Literary Research Society</b> .....	28
Section two <b>Zhou zuoren’s theory of the “ art of life”</b> .....	32
Section three <b>The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art of lif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terature</b> .....	35
<b>Conclusion</b> .....	40
<b>Reference</b> .....	41
<b>Postscript</b> .....	45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 绪 论

“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命题的提出，引起人们对文学史叙述的极大关注。围绕“中国现代文学”的讨论已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的表达。在现代性的理论关照下，传统文学史关于“现代文学”的定义、性质、范畴等已遭到不断的质疑。关于“现代文学”的历史开端问题尤为突出，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关系到如何重新叙述、判断这段文学史的观念问题。传统的文学史观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这种政治性的标准显然无法准确地叙述文学自身的历史裂变。在现代性理论的观照下，学界出现了“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新观念，这一新的文学史叙述方式，使研究者的视线回到晚清。“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众多学者纷纷把五四新文学或文学现代性的开端拉回到晚清。遗憾的是，观念虽然更新了，但中国现代文学史演变的开端何以在晚清？五四新文学与晚清文学是否有联系？有怎样紧密的联系？这些都是需要具体地清理的实质性问题。“回到历史本身”，“回到文学史本身”，重新概括五四新文学的特征，并厘清它与晚清思想及文学的关系，是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

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信中写道：“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sup>1</sup> 同样的，五四新文学在本质上虽有别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它的形成并非是突发性的，其量变过程始于晚清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五四新文学中的启蒙主义、情美论、“人生的艺术的综合观”等特质均发端于晚清，以晚清的先进思想材料作为其前提。

首先，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理性精神源自晚清的思想界。五四新文学的观念多倾向于文学的社会性、工具性，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主张文学服务于思想启蒙，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强调用科学与民主作为现代精神去指导新文学创作。立国首在“立人”、对国民性的批判、对传统纲常伦理的抨击，社会问题小说的创作等，这些文学思想观念和创作倾向的渊源均始于晚清思想。如梁启超的“新民”、“新小说”、“改良群治”，严复的“民智、民德、民力”，在启蒙主义精神和话语逻辑上，与五四新文学如出一辙。晚清思想界对国民性批判，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5页。

对传统道德的批判，晚清文坛上社会政治小说、妇女解放小说、翻译小说的出现，与五四新文学中“问题小说”的社会问题意识，及其批判性有直接的联系。五四“文学革命”所依赖的知识范式，也没有逃脱晚清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科学与“民主”的范畴。

其次，五四新文学中感性个体的审美主义思潮也源自晚清。个人的解放，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感性个体情欲的肯定，主体审美自觉的强调等是五四新文学的特色。五四新文学中盛行“自叙传”、日记体等极端私人化的情欲叙事模式，其中充溢着个人化的情感、身体、性、爱与欲望等话语，这种个人化的情感话语和私人化叙事模式以及对于传统审美意识——中和之美的突破等，均和晚清文坛有关联。晚清涌现出大量个人化情欲型小说，如“狭邪小说”等；苏曼殊“飘零者”的主观化叙事风格，对五四时期郁达夫等“零余者”形象明显存在着影响；五四大量的书信体、日记体小说，在林琴南的翻译小说、徐枕亚、周瘦鹃等创作的小说中均可寻到踪影。

再次，五四新文学中“人生的艺术”这一综合的文学观也和晚清的思想传统有关。五四时期，创造社成员与文学研究会成员中都有一种否定简单的“为人生”或者“为艺术”的文学观点，他们提倡综合“人生”与“艺术”的“人生的艺术派”理论。这种综合性的理论来源与晚清思想界也有关联，如周作人“人生的艺术派”的观念最早就形成于晚清时期。不管是创造社还是文学研究会，对于“人生”与“艺术”的综合，其思想渊源就来自于晚清，特别是王国维、黄摩西、东海觉我、金松岑等人的文学观念。

## 第一章 五四新文学启蒙理性主义的晚清渊源

“五四”是思想启蒙的时代，五四新文学充满了启蒙理性主义，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新文学观念势必具有浓厚的社会性、现实性、批判性和工具性倾向。“文学革命”思潮一开始就主张文学服务于思想启蒙，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并强调用科学与民主作为现代精神去指导新文学创作。五四新文学中的立国首在“立人”、对国民性批判、对传统纲常伦理的抨击、“问题小说”的流行等，无不显示着五四新文学浓郁的启蒙理性色彩。文学充当了启蒙的工具、社会批判的武器、探讨与拯救人生的良药。然而，五四新文学的这种特色，并不仅是在“五四”那一时刻的突然爆发，其启蒙话语、创作倾向和赖以形成的知识背景等的形成，均可在晚清思想中找到源端。五四新文学主张中所带有的强烈工具性和功利论的色彩，也和晚清开始的文学变革的传统相关联。

### 第一节 文学启蒙观念的逻辑延伸

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多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文学革命自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在本质上就决定了文学革命的启蒙内质。新文学倡导者从一开始就充分注意文学作为启蒙的工具，变革传统和反封建的有力武器，十分注重和张扬文学所具有的社会批判功能。如果说胡适的文学改良还是温和的“文体革命”，那么陈独秀就大张旗鼓地提出了文学性质和内容的革命，这就是“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sup>[1]</sup>

陈独秀发动文学革命的原因是将文学革命看成社会思想政治革命的一部分，欲以文学革命铲除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旧文学，以新思想唤醒沉睡的国民，确保政治革命成功。陈独秀要求新文学成为“国民文学”，主张文学的平民主义姿态，反对文学仅仅成为贵族阿谀消遣的工具；建设“社会文学”是要让世俗社会进入文学描写的范围，以引导文学关注社会现实；而“写实文学”的主张是注重文学

的写实性，是基于写作手法上的考虑。陈独秀提出的新文学建设的三个目标，注重文学的平民性、写实性、社会性，从文学面对的主体、文学写作手法和文学描写的内容三个方面为五四新文学定下了基调。显然，这一基调充溢着启蒙理性主义色彩，带有了浓厚的功利性倾向，对五四新文学的形成起着深远的影响。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中的文学主张便是新文学启蒙工具论的范例：“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sup>[2] (p1)</sup> 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其“严肃”地“研究”人和人生的文学主张，正是启蒙主义话语的表征。五四新文学革命不仅是“白话运动”等文学形式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文学思想上的革命。这种革命为反封建提供思想指向，为批判封建社会的伦理法规提供思想利器，其目的是为着中国的思想启蒙这一政治任务。

但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思想启蒙导向的产生，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形成，并非突如其来。开启这一文学变革的历史源头在于晚清的文化思想界，如果没有从晚清时期所开始的思想积淀，很难想象“五四”能在一夜之间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全新的历史开端。

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早在 1907 年就树立起了思想文化启蒙的观念，这首先体现在立国首在“立人”的观点上。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玄天下者，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其首在立人，人立后凡是举；若道其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sup>[3]</sup> 何以要开启“立人”之说呢？原因便在于“中国已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sup>[4]</sup> 鲁迅感应到中国所处的巨大的社会危机，若欲建立“人国”以“角逐列国是务”，以“争存于天下”，首先要“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先“立人”，而才有可能立“人国”。那么，何以“立人”呢？1905 年，鲁迅在日本看了“战事画片”后猛然醒悟：“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sup>[5] (p417)</sup> 显然，此中透露出鲁迅从事文艺运动的思想逻辑：从“立人国”的目的出发，到“立人”，再到用文艺来“立人”。可见鲁迅的文艺观念从一开始便带有强烈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倾向，是为“立人”、“立人国”服务的。鲁迅在 30 年代回忆起当时的创作情况时，也体现出了他一以贯之的文学启蒙观：“说

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sup>[6] (p621-622)</sup> 所以鲁迅在五四期间创作的小说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识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主意”。<sup>[7] (p621-622)</sup> 鲁迅当时从事文艺运动所持有的文学观，代表了五四新文学观念中启蒙理性主义的一脉。

如若寻根溯源，鲁迅在当时所持的文学启蒙观，有着更为深厚的历史语境，这就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观念。梁启超在 1902 年发起了“新小说”运动，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强调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  
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  
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  
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sup>[8] (p33)</sup>

梁启超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一夜之间从“小道”上升为“最上乘”。论文的结论是：“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作为社会政治改革者的梁启超如此关心文学，如此拔高小说，是因为小说能够“改良群治”，能够“新民”。梁启超的“新小说”运动与五四新文学革命在根本性质上是一样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文艺运动，而是带有浓厚社会启蒙色彩的政治思想变革，是将小说作为社会改革，作为“新民”，即启蒙的工具。

晚清轰轰烈烈的“新小说”运动的倡导者们，也毫不掩饰他们所持有的文学启蒙观。最早提倡小说的严复、夏曾佑就指明，提倡小说的“宗旨所存，则在于使民开化”。<sup>[9] (p12)</sup> 康有为在 1897 年考察上海文坛之后说：“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心阅读，莫小说若也。”<sup>[10] (p13)</sup> 小说可以用来“启蒙知识”、“引以正道”，康有为也正是在这种目的下，开始支持小说。另外，邱炜璜的《小说与民智的关系》、衡难劫火仙的《小说之势力》、公奴的《金陵卖书记》、楚卿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姚鹏图的《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等大量论文，均从小说与社会、民智、民德的关系出发，对小说进行研究。从 1902 年起，《新小说》、《大声小说报》等众多刊物，在“发刊词”、“缘起”中均将小说写作的目的指向社会启蒙。大量的史实说明，晚清文坛对于小说启蒙功能的认识，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形成一股

共同的思潮。晚清这股把小说作为启蒙工具的思潮，与五四时期作家们运用文学来改革社会、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观念的形成，有着内在的承续与扩展的关系。

在晚清这股思潮中，梁启超对“新小说”所持的文学观念有着明显的社会针对性，“新小说”直接为“新民”服务。他在《新民说》中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有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一国之所以能立于大地而日进无疆者，非恃其国民之智识，而恃其品性。”<sup>[11]</sup>

梁启超称“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认为只有开启国民智识，提高国民素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康梁等维新派在自上而下的变法失败后，才将目光投向自下而上的文化思想启蒙。梁启超对于“新民”的强调，其逻辑起点在于“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经脉、血轮也。……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sup>[12] (p574)</sup> 国依赖于民，故非“新民”不可。所以，梁启超的整体思维逻辑是：要拯救民族危亡就要“新国”，“新国”就必须“新民”，“新民”就必须“新小说”。

同样，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先驱者，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梁启超们没有太大的区别，如何拯救国家民族的危机也成为他们思考的重心，通过文学革命改革传统的封建文学，让文学作为启蒙工具来唤醒民众，这也是必然的思维轨迹。因此，梁启超的“新小说”的倡导和鲁迅的“改变精神”首“推文艺”的主张，在历史语境和逻辑关系上遥相契合，“新民”与“立人”有着内在的前后贯连的脉络，在立意与精神内涵上颇为一致。两者间共通的逻辑话语从根本上促成了晚清到五四知识分子一致的启蒙姿态。更重要的是，梁启超选中用小说来进行社会政治启蒙的逻辑态度与鲁迅等五四文学革命者一样，都是从文学作用于人的心理和精神角度来考察。梁启超认为小说的功用具有的“薰”、“浸”、“提”、“刺”四种，对接受者有“不可思议之力”<sup>[13]</sup> 鲁迅也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要推文艺”，这都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来思考文学的功效。

晚清的“新小说”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还都注意到启蒙的思想深度问题。早在1895年甲午海战之败后，严复在《直报》、《国文报》上发表了多篇言辞急切的文章，《原强》一文尤其深刻：

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sup>[14]</sup>

严复以“民智、民力、民德”为本，对于洋务派只重器物的“标”加以驳斥，在《论世变之亟》中更是将自然科学称为“形下之粗迹”，<sup>[15]</sup>这显然已经触及到根本性的思想及文化心理层次的问题。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也深刻反省到西方之所以富强，原因在于“必有道德学问以为本原”，这种对“本原”的追求，让梁启超认识到“（西方）近世史与上世、中世特异者不一端，而学术之革新，其最著也。有学术新，然后才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sup>[16] (P391)</sup>将“近世文明初祖”给予了思想、观念、方法的革新者——“培根与笛卡尔”。可见严复、梁启超，直至鲁迅，在晚清时就已经认识到变革图强的根本在于精神思想的彻底更新，将启蒙的深度与广度提升到思想文化这一层面。这种启蒙氛围所铸造的历史语境从晚清开始形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展开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五四新文学所具有的启蒙理性精神，以及文学功利主义要求，与晚清“新小说”运动有着一致性和承接性，而且在文学创作倾向上，它们之间也有较大的联系。

## 第二节 社会批判性创作倾向的认同

五四新文学在启蒙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其创作具有强烈的理性批判色彩，作品的内容纷纷指向社会现实和人生。这种强大的理性精神使得文学创作成为暴露社会、人生弊病的工具；成为反对封建传统，抨击伦理道德的武器；成为传统国民性批判的载体。五四文坛成为了反封建、批判现实、改良人生和思想解放的舞台。五四新文学中出现这种群体性的具有思潮形态的创作倾向，并非在中国文学历史上首次上演，晚清文坛同样存在着社会批判的先行者。五四新文学创作中的国民性批判、“问题小说”、以及以妇女解放为代表的反传统伦理的精神，均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相应的晚清文学的创作。晚清文学作为本土性的创作更具有开创意义。

五四时期掀起的“国民性批判”高潮，鲁迅无疑是批判的思想先驱者。他在五四时期的作品，形象而深刻的刻画了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在五四时期创作的《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类人物为对象，以“国民性批判”为统领，揭示了他们的精神的危机和创伤，暴露出国民灵魂深处的奴性。这种以显示国民的精神病态为主旨，揭示“吃人”的病态社会的文学作品，其中所蕴含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其实在晚清就已经出现，并在晚清掀起过高潮。

鲁迅对于“立人”的愿望与梁启超期于对“新民”的要求，内在逻辑一致，立论的导向一致，都转向了对传统国民性的批判。梁启超在《新民说》、《新民议》、《论中国国民之品格》、《国民十大元气论》等文章中对国民缺乏“公德”、“自尊”、“爱国心”、“独立性”、“自由观念”等进行了激烈批判。将中国积弱的风俗原因归结为六条：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sup>2</sup> 并总结说：“以上六者，深根固蒂也，经历数千余年……”<sup>[17] (P691)</sup> 最后梁启超将国民性弱点的“根性”归结“奴隶”：“呜呼！吾一语及此，而不禁太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sup>[18]</sup> 由此，晚清思想界展开了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持续性批判，<sup>3</sup> 这些思想显然成为了五四文学革命者的资源。鲁迅、陈独秀等对于国民性弱点“奴性”的一致看法，就很好地说明了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在国民性问题认识上的承接性。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sup>[19] (p212)</sup> 阿Q这个最具普遍性的人物角色是对这两句话最形象的注解。鲁迅还将中国的历史归结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sup>[20] (p213)</sup> 这些言论与梁启超等晚清思想家所论，如出一辙。五四新文学中对国民精神性问题的强烈反省和批判，明显地承接了晚清以来激进知识分子的批判态度。

晚清对于国民精神性的批判基本上还是以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较少体现于真正的文学作品中，但对于国民性弱点的认识与批判已经形成了浓郁的历史氛围。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创作思潮倾向的形成，肯定要有历史环境氛围的构成，其深化也必须是一个渐行的进程。从晚清到五四，对于国民精神改造的持续高度关注，终于在五四新文学中转化为以鲁迅为代表的形象而深刻的文学作品。

2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2)》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679页。

3 1902-1904年的《大公报》、1904-1907年的《东方杂志》、《国民》、《国民日报》等都对国民性问题作了讨论。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mailto: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